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

冯德连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内向型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双循环发展战略。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双循环有机统一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有高层次开放、制度型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和安全开放。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路径有全球治理路径、制度创新路径、产业国际化路径和企业国际化路径。

〔关键词〕对外开放;外贸发展战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制度型开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0.008

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提出和深刻阐述了双循环发展战略。我国“十四五”规划把双循环发展战略进一步落实,战略导向部分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我们可以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称为“双循环发展战略”。理解与贯彻双循环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本文在考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演变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与路径。

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

外贸发展战略的类型多以内销和外销奖励

的平衡特征划分。世界银行根据有效保护率、配额和许可证、出口奖励、汇率定值等指标,把外贸发展战略分为坚定外向型、一般外向型、坚定内向型和一般内向型。^{〔1〕}Chenery 等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指标把外贸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基本类型。^{〔2〕}根据内需与外需关系的重要性,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贸发展战略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 至 1977 年内向型发展战略阶段

1949 至 1977 年,我国制定和实施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向型对外贸易政策。“一五”计划(1953—1957)期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我国从苏联和东欧

作者简介:冯德连,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安徽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产业经济。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重大项目“基于共生理论的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研究”(KJ2020ZD001)的阶段性能成果。

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例如,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 156 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156 项工程)。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了与我国合作的大多数项目,我国开始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1962—1966 年,我国从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引进多项先进技术与设备。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随着 1971 年中美关系缓和、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 1972 年中日建交,进口外部环境改善,我国计划大规模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1973 年国家计委建议今后 3—5 年内引进 43 亿美元设备(“四三”方案)。之后,又陆续增加了一些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51.4 亿美元。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内向型发展战略阶段,实行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排斥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立足于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贸易规模小,1950 年对外贸易额 11.4 亿美元,出口贸易额 5.5 亿美元;到 1977 年对外贸易额增长到 148.0 亿美元,出口贸易额增长到 75.9 亿美元。出口贸易是为了换取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满足国内工业投资需求。

(二)1978 至 2019 年外向型发展战略阶段

1978 至 1992 年,我国进行了以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1979 年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我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先行探索我国对外开放。1984 年我国批准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加速。1992 年我国批准 14 个沿边开放城市,沿边城市对外开放加速,同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1993 至 2000 年,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2001 至 2019 年,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

阶段。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对外开放进入在法律框架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开放。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巨大潜力。这一阶段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特征是出口导向、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 年对外贸易额 206.4 亿美元,出口贸易额 97.5 亿美元;到 2019 年对外贸易额增长到 45778.9 亿美元,出口贸易额增长到 24994.8 亿美元。从 2009 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国和第二进口国。但是,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外向型发展战略暴露出对外贸易粗放增长、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严重的问题。加上一些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盛行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这一战略难以为继。

(三)2020 年以来双循环发展战略形成阶段

双循环发展是我国近十年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 2006 年这一战略的弊端和风险日益显现,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我国 2006 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指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市场需求下降,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空间收窄,迫使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2011 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指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6 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强调改善消费环境、创造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基础作用,指出“以消费环境改善释放消费潜力,以供给改善和创新更好满足、创造消费需求,不断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2020 年 4 月以来,习近平关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七次讲话精神标志着双循环发展战略正式形成。习近平首次提

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讲话的时间和场合是2020年4月1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之后习近平六次重要讲话的时间和场合分别是: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2020年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2020年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研究文献把习近平最早提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时间和场合误以为是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实际上,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就已经提出。

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统一的开放。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坚定不移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主要特点是高层次开放、制度型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和安全开放。

1. 高层次开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3]高层次开放的含义主要有:一是制度型话语权更高。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二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程度更高。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习近平指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4]搞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损人不利己。三是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

动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促使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端和品牌营销端延伸。

2. 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升级版,本质上属于境内开放,强调基本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与国际标准实现对接乃至引领新一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打造吸引、集聚和培育高端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软环境。^[5]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由“边境开放”逐步向“边境后开放”的拓展和延伸。拓展制度型开放,关键是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3. 全面开放。全面开放的含义主要有:一是陆海内外联动,加强一带一路的联动,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二是东西双向互济,强化东部深化开放和中西部加速开放的联动,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对外开放的“领头雁”作用,率先实现高水平开放和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带动中西部、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和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产生雁阵效应。三是产业开放更加深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巩固制造业开放措施。重点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更广泛地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

4. 公平开放。2013年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6]公平开放的含义主要有:一是非歧视性,强调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非歧视性原则是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在国际贸易中的延伸,强调无差别待遇。二是公平竞争,反对倾销和补贴。公平贸易原则是关贸总协定(GATT)和WTO的一个基本原则,各成员和出口经营者都不得采取倾销、补贴等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国际贸

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秩序。同时加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遵循和实施礼让原则。强化反垄断执法程序的国际合作。三是互利共赢,加强开放合作。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指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7]四是内外向国际化相互促进,强调贸易平衡。既重视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技术转让,又重视进口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转变更加重视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现象和倾向。

5. 安全开放。经济安全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线,必须严格控制。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2020年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引发各国疫情的再次暴发和蔓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分散和转移国内压力与矛盾,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一系列干预和打压措施。我国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充分识别、防范和化解对外开放引发的经济风险。“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8]牢牢把握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有效监管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等快速变化引发的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统一的开放

经济循环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机统一

的系统。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统一的高水平开放。

1.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需求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国内市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企业发展、持续投资与创新的动力,并在日趋复杂的产业环节中建立企业的竞争力。^[9]而对于国内市场规模大的经济体,国内需求对本国经济发展更加重要。1980年Krugman提出本土市场效应,认为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倾向于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或地区组织生产和出口。^[10]根据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发展有6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1]对于大国来讲,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投资主导型,强调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出口导向作用更加明显;到了大众消费阶段,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国内需求作用更加明显。我国正处于大众消费阶段,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依靠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多层次消费市场和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三个特色优势,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内生市场动力,为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提供安全有效保障。^[12]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72447元,折合10504美元。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我国强大的发展韧劲所在,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

2.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必须看到,中国虽然具备大国经济规模,但是国内有效市场需求规模相对有限。2020年全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月人均2682元;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只有15204元,月人均只有1267元。^[13]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决定着低收入阶层尚处于潜在的市场需求阶段而非凯恩斯理论提出的有效需求。因此,相对于国内有

限的有效市场需求者,更大的国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14]双循环发展战略是高水平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前提是高水平开放,落脚点是推动国内的体制变革、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型。对外开放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技术进步和分工专业化获取开放的利益,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15]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指的是以开放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是以高水平开放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搞封闭经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客观要求我国发挥巨大内需潜力,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联通、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互接互补。需要继续开发本国的能源、资本、人才和技术,同时积极利用世界的能源、资本、人才和技术,在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发挥国内全产业链优势的同时,积极布局全球产业链。

三、健全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路径

对外开放路径主要有全球治理路径、制度创新路径、产业国际化路径、企业国际化路径。

(一)全球治理路径

1. 积极参与WTO改革。维护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坚定维护非歧视性、互惠贸易、市场准入、透明度、发展中国家优惠等基本原则,坚定支持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电子商务等议题的谈判,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6]

2. 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到2021年8月,我国已经达成19个自由贸易协定,同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些协定。当前正在加紧形成一个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速推进相关国家核准并尽快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

协定,推进中国和海合会,以及和以色列、挪威的自贸协定谈判。稳妥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

3.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贸易畅通不断深化,投资合作持续提升,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机制平台建立健全。据202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发布,2013—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136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2.7万家,实际投资累计约6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近6400亿美元。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需要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互惠共生的产业转移机制与路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二)制度创新路径

1. 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始于2013年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21年我国已经分6批建设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经济高水平开放、对接国际规则的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要发挥高地引领作用,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跨境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人才政策、税收政策等领域更高水平开放。同时,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赋能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赋能产业集聚、产业升级,走差异化改革创新之路。

2. 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依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形成有利于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制度创新。在竞争中性和规则中性、政策中性、产业中性、所有制中性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制度型开放的新政策举措。注重制度对接、创

新和引领,建立并完善以公开、规范为主要标志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注重制度对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与国际经济制度高度衔接的制度体系;注重制度创新和制度引领,积极为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作出“中国贡献”。

3. 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 77.9 分,排名全球第 31 位,总体得分低于美国(84.0 分)、英国(83.5 分)、澳大利亚(81.2 分)、德国(79.7 分)等发达国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是我国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任务。要落实我国《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低的关税水平、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便利的市场准入、更透明的市场规则、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把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 产业国际化路径

1. 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提升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通过研发补贴、进口税等措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通过提升全球价值链核心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取国际产业垄断租金。加强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促进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开展协调创新。

2.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我国要科学规划产业链,确保重点产业有序发展;有效提升价值链,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力稳定供应链,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协同打造创新链,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着力筑造防护链,增强产业的风险抵抗力。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产业链多环流体系。重点围绕 5G、半导体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部署创新链,逐步提高上游研发设计环节的自给率。

3.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由核心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中介机构、政府支持机构等高度集聚形成的技术领先、协同度高、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网络和产业高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强者越强的正反馈效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美国“硅谷”,英国剑桥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高科技集群,我国中关村高科技产业集群、深圳通信设备产业集群、武汉“光谷”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功实践,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供了先进经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在产业集群国际化、区域创新网络、科技创新、营销创新等方面入手,促进产业集群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四) 企业国际化路径

市场规模扩大可以缓解消费者需求偏好多样化和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矛盾。^[17] 市场空间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大。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本国跨国公司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催生出一批世界级一流企业,石油、军工、船舶、航空工业等规模经济行业的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2002 年中国大陆上榜企业为 11 家,美国是 132 家。此后,中国上榜企业数量持续增加,陆续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与日本的企业上榜数量,到 2019 年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数量首次与美国并驾齐驱。必须看到,中国大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偏低,非银行大企业盈利能力更低。2021 年《财富》500 强统计,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上榜 135 家,大于美国上榜企业数量(122 家)。但是,与美国上榜企业比较,中国企业盈利指标较低。135 家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平均利润约 35 亿美元,低于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51 亿美元)。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约为 5.4%、净资产收益率约为 8.7%,低于美国上榜企业的销售利润率(6.5%)和净资产收益率(11.8%)。

1. 提升制造业跨国公司盈利能力。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培育制造业跨国公司。从银行盈利能力显著大于制造业企业看,国内的财富分配是向资本倾斜的。据2021年《财富》500强统计,进入榜单的中国10家银行利润总额占全部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41%。中国大陆上榜的125家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只有23亿美元,只有113家美国上榜的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47亿美元)的49%。银行利润过高必然挤压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如果虚拟经济企业赚钱更容易,就会抑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房价、高利率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障碍。要从“以资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促进制造业跨国公司发展。通过避免贸易冲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具有巨大规模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产业垄断利润的国际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2. 培育技术标准优势。在产业国际竞争中技术标准的引领者往往处于市场领导地位。微软的视窗标准和英特尔的芯片标准奠定了两家公司巨大的规模和利润。据2021年《财富》500强统计,微软公司销售收入1430亿美元,利润443亿美元,销售利润率31.0%;英特尔公司销售收入779亿美元,利润209亿美元,销售利润率26.8%。我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通信设备,5G国际技术标准优势已经成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重要的国际市场优势。

3. 培育核心能力优势。Prahalad & Hamel把核心能力的含义界定为多种技术流整合和组织协调的积累性知识。^[18]可以把核心能力看作企业的无形资产和专用资产,具有价值性、独特性和延展性。要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低成本、差异化或集中一点的竞争优势,在专业化分工领域做强做优做细分产业引领者,培育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济出版社,1987年,第78-85页。

[2] Chenery H, Robinson S, Syrquin M,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11-347.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4]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4月26日,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5] 戴翔:《要素分工、制度型开放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6]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年9月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7]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杭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

[8]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9]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68(2), pp. 73-93.

[10] Krugman P R,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pp. 950-959.

[11]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16.

[12] 钱学锋、裴婷:《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内生动力》,《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

[14] 沈国兵:《疫情全球蔓延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贸发展的困境及纾解举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5] 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与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6] 李波、陈卫东、杨国华:《客观认识WTO当前困境以战略思维推进WTO改革》,《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7期。

[17] Dixit A,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3), pp. 297-308.

[18] Prahalad C K, 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68(3), pp. 79-91.

[责任编辑:刘 鏊]

注释:

[1]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